

杨 向 奎

宗周社会 与 礼乐文明



K224.0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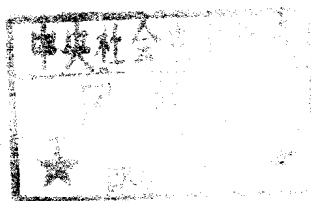
82298



200415452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张 健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

杨 向 奎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333,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01-000971-6/K·182 定价 7.25 元

序 言

这不是一部西周断代史，我只是对宗周社会历史作一些专题研究。但这些专题研究要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不是一部论文集。因为是专题研究，所以在前后章节中的内容，有时不免重复。我想避免过多的重复，因之在相似的内容中还是有所区别。这部书涉及的问题不少，而有关的古史材料却不多，越往上溯，材料越少、越难，越难运用。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间社会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因此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民族所及中央民族学院的朋友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及启发，我向这些朋友们谨致谢意。

历史是时间的坐标，没有历史，在社会上很难有时间的感觉，人们在何处寻找时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子的时间感，时间在不断的流。但这时间流如果没有历史为坐标，纵的时间流将化为横向空间，如百川之汇于大海，何处再有时间。时间空间是可以转换的，这是历史时间的本质。

虞夏商周是中国最古的四代，这些坐标，我们说这是中国古代史；汉魏六朝是中国中古。没有这些古代、中古，就没有历史，人们就丧失时间感。没有时间的宇宙是“三维”，在三维世界中没有生

0072/10

命，没有生活，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历史。在本质上历史的时间与宇宙的时间是可以统一的。

此书从宗周的氏族源流开始，是周民族的历史开端，也就是属于周族的历史时间开始了。历史的载体是空间，我们遂续作周初的历史地理研究。周氏族上场了，他们占据了空间，舞台属于他们而有所作为，于是历史时间也属于他们。

宗周是夷夏合流，此后华夏民族形成，而“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为以后中华民族之灿烂文明建立下良好的基础。我们研究了宗周的礼乐文明，这种文明离不开文王周公之开明设施，春秋时代继续发展，管仲、老子、孔子及墨子四大家出，遂使中国之传统文明，由浩瀚的洪波汇成几支巨流。孔子发展了儒家，使相礼的小人儒变成君子儒，遂使“经学注我”，而经学变成儒家私学。于是经学与儒家合，儒家与教师合，师儒不仅经师且为人师矣。华夏族之民间教育遂为师儒垄断，有此垄断，儒家影响遂无孔不入，有饮水处即有儒家。儒家思想陶冶了民族性格，于是，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会有四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这是我在本书内阐明的观点之一。是与不是，尚望高明指教。

墨子在古代世界科学上的成就是空前的。在科学史上最先使时间、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是《墨经》。而且《墨经》在数学分析及力学方面的成就更是惊人。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玻恩(Max, Born)，当他不了解中国科学史前，以为只有欧洲人才有科学；了解后，方知不然。其实玻恩还不了解墨子，如果了解，更会有不同评价。墨家是自豪又自信的，墨子弟子曾经说：

“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

子墨子之言将永在也。墨家以外，尚有名家惠施，与墨家互相誉应的惠施多能“其书五车”。

我不想夸大中国古代文明，书中所言，都有实证，甚盼我们的古史专家、哲学史家、科学史家，不吝赐教。

杨向奎

1987.8.10.

目 录

上卷 宗周社会

第一 氏族篇与地理篇	3
氏族篇	3
地理篇	44
第二 建国篇	95
(一)文王兴起	95
(二)武王伐纣	112
(三)周公摄政	136
(四)成王建国	160
第三 社会篇	180
(一)社会发展模式	180
(二)信仰与迷信	195
(三)社会思潮	207
(四)风俗人情	216

下卷 宗周的礼乐文明

第一 礼的起源	229
(一)导言	229
(二)礼尚往来	244
(三)冠礼、婚礼	257
(四)军礼	268

第二	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	277
	(一)周公制礼作乐	277
	(二)德与礼	330
	(三)诗与乐舞	336
	(四)本章总结	352
第三	孔子对于礼乐的加工与改造.....	358
	(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358
	(二)仁与礼	392
	(三)君子儒与小人儒	411
	(四)本章总结	422

上 卷
宗 周 社 会

第一 氏族篇与地理篇

氏 族 篇

(一)

氏族虽然是以血亲为基础的非常古老的组织，但它并不包括一个共同祖先的全部子孙。联系亲属的纽带以母方为主，只有按女姓下传的世系，它包括出自一个假定的共同女姓始祖。这位始祖及其子女，她的女儿们所生的子女，她的女姓后代所生的子女，一直由女姓传袭下来的各代统统包括在氏族之内；而她的儿子们所生的子女，她的男姓后代所生的子女，由男姓传下来的各代则都属于别的氏族，也就是各属于其母方的氏族。当子女的父方尚无从确定而只有母方才能作为识别世系的标准时，这是氏族的最古老形式。由于氏族内部禁止互婚，从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当氏族观念日益发展时，很自然地出现成双配对的氏族，只有同时出现两个氏族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我国古代周族的姬姜两氏族之互相婚配，正好说明这种事实。（参考杨东莼等新译《古代社会》66—67页）

因为有“很自然地出现成双配对的氏族”不甚明确的主张，所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有人说“同姓不婚，自古厉禁，与同图腾团体不婚亦同。”现在我们能看见的古史，多由周鲁所遗传，姬姓以外的事，亦以姜姓者居多。且姬姜两姓婚姻的频繁，亦足证两族关系的密切。后稷之母姜嫄，古公之妻姜女，武王之后邑姜，以及春秋鲁国夫人之多姜氏。因此我颇疑姬、姜乃古代部落中之左右两

部。”(见李玄伯《古代社会新研》第一章)

姬姜两姓通婚是事实,这是族外婚。但李先生说他们“乃古代部落中之左右两部”,却没有根据。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国语·晋语》四曾经有关于姬姜两族由来的记载: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近,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駭敬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

这说明了姬姜两姓的来源,而“少典”可能是姬姜两族联盟,融合成华夏族后,加上去的“共祖”。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华夏集团“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两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作炎帝,一个叫黄帝”。(见原书 40 页)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国全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所构成,而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四代,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周代的文化承袭了夏、商,到孔子时代还是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们不是在接受外来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这当然泯没不了

夷夏两集团的区别,我只是说,氏族间的融合是渐进的,不是到了某一个时期突然变成的。以夷、夏为例,他们最初曾同处于黄河下游,互相交往,互相渗透,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看夏初少康以前一段动乱的历史,即夷夏交争的结果,而这种“交争”,并不等于异族侵略,罗泌《路史》,就比之于安史之乱,羿、浞实是夏之叛臣,虽然傅孟真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夷羿是夏敌国之君。(见《夷夏东西说》)我们研究有关这段历史的史料,至少可以说夷羿与夏的关系本来密切,《左传》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略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享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以上“因夏民以代夏政”,及“在帝夷羿,……忘其国恤,……用不恢于夏家”等记载,看不出夷夏两族交争而斗的痕迹。而夏启与伯益之争位,更可以说明夷夏一体,《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万章》)。又《天问》“启代益作后”,《古本竹书》,“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属于东夷,而与夏之关系如此,说明他们早已融为一体。我们说,在华夏族的构成中,并不止夏周一支,而东夷一支在华夏文化的形成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田昌五同志下述意见是可取的,“从部落王国到夏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而夏文

化则为华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文化。”(见《古代社会形态析论》202页)夏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化,因为其中融合了夷族的文化成份,这在考古发掘上看到了“文化叠压关系”中更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夏族实际上和邻近的部族通过斗争与联合而形成灿烂的华夏文明。田昌五同志又说,“这种联合和兼并的过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显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区交错而处的现象。交错而处必然要发生斗争和联合。后来在这种斗争和联合中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同上书)虽然他所谓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的论断,也许还有争议,但作为一条通则来说明,中国古代夷夏两族因邻近交处而有过斗争与联合,因而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是无可非议的。上面谈到的夷羿与夏族的斗争,是联合后的斗争,在夏族的眼中,帝羿之不悛于夏家,是淫于原兽的结果,并不因为他是“夷帝”。

因此我不同意按地域划分民族构成的理论,自傅孟真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发表以来,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沿此路继续发展,虽然他们几位之间也许是不谋而合。傅孟真先生的结论是:

1. 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義,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同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乙,《诗·商颂》,“宅殷土茫茫”。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殷、衣、韦、郛、卫、沔、兖,尽由同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

迹，可以推知矣。丙，《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

此外傅先生又根据王恒与有易一段相杀的故事，及《山海经》中《大荒东经》所记帝俊竟是大荒东经中唯一之帝，而由统计以看帝俊之迹及其宗族，独占东北方最重要之位置。帝俊既见于殷墟文字，称曰高祖，而帝俊之地望如此，则殷代龙兴之所在可知。

这些地理位置都是言之有据，可以信赖，但以下谈到夏代地理位置时，则一味偏西，而构成夷夏东西说。其实古代民族迁徙无常，傅先生论述殷商民族，即可作证。他说殷商是一个“东起海东，西至岐阳之大帝国”，乃由迁徙而扩大，因此我们也不能把夏族固定于西方。他们，夏代初年曾和殷商以至东夷有许多交往，正如傅先生所说，夷夏“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夏东西说》）。说他们“对峙”并不是遥距离的对峙，而是混在一起的力量对峙，因此我们不同意夏族来自西方的理论。

傅先生又搜集古文献中有关夏史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最西所至，我们现在不知究到何处，……最南所至，我们也不知。……我们现在知诸夏西南北三方所至之大齐，而以夷夏之称，夷夏之战，确知夏之东界，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

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同上书）这样使夷夏各据东西一方而遥遥相对的绝对说法是行不通的，夏和夷一样也有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

五十年前当傅孟真先生宣布他这篇鸿文巨制时，我即有反对意见，几十年来，此意未变。我曾经有过《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刊在《禹贡》半月刊上（期数待查），后来顾颉刚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采用此说。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夏史论丛》载有我的《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内容是：我们认为，古代中国（三代）和中国近代不同，表现在政治中心并不是长期固定在一个点上，它是经常迁徙的，如果我们把夏、商、周的政治中心永远固定在某一点上，明显地违背历史事实。就商而论，它经常迁徙，傅先生在原文中也曾经叙述到，但关于夏代，论其区域，东不过“平汉线”，在他的原文里有关夏域的论述，当然不是全错，但有许多缺点。一是他自己在自相矛盾，一面说“夏之区域……东不过平汉线”；同时又说，“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在一段文内而前后矛盾若此。他或者说夏之政治中心始终在西，而盛时势力至于商丘，但这样又是忘了古代王朝曾经多次迁徙的事。夏族由部落进入国家比殷商早，社会发展阶段比殷商靠前，他们的迁徙更容易些。我们也不能说夏初的夷夏之争是界限分明的斗争，在上面已经交待过，他们是内部交争，夷夏杂处，已由对峙趋于融合。他们之间有力者为王，国家的构成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所谓华夏文明，其实包含有许多东夷成分，孔子，墨子的远祖都是东夷！我们认为夏初居于东方与早商及群夷杂处，其初交争互有胜负，后来由于夷盛夏衰，而夏西徙以避其锋，或者由于黄河下游水患而上迁。总之我们把夏族永远定居在一点上，一如我们固定殷商或宗周在某一点上一样，是不科学的。

夏朝始祖是大禹，或者上及鲧与黄帝，黄帝与鲧问题复杂，留

待下文。先说大禹。关于大禹的故事最著者为治水及分州，均见于《尚书·禹贡》篇。我国古代文明滥觞于黄河下游，夏代初期又迁徙流转于此地。而黄河下游自古多泛滥之灾，《禹贡》之黄河下游“播为九河”，也可以说明黄河下流水道之不稳定，或者即以部分水患为普遍大水灾，遂有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而夏族之以龙蛇为图腾亦原于此。大禹治水又见于《诗·大雅·文王有声》，《商颂·长发》及《尚书·吕刑》，盖在西周时已认定大禹为奠定中国山川者，凡中国后人所居皆为禹迹，故“禹迹”，“禹都”即为天下（中国）之代表名词。从“禹迹”中我们不能肯定大禹活动的中心地区，但关于九州的划分，《禹贡》九州，而河北、河南、山东之交有四，分州之重点，在黄河下游，则夏族之活动中心，初期在黄河下游又添一佐证矣。

据《史记·夏本纪》，禹后为启，启后为太康、中康、相及少康，但《史记》于启后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事实没有记载，以致傅孟真先生说，“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训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见《夷夏东西说》）。这的确是太史公的失策，《史记·夏本纪》而没有羿浞少康之纷争，一如唐史之无安史之乱，清史之无太平天国也。这段故事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的记载中，因此知夏代于后相时曾有动乱，扰攘数十年，卒由少康中兴，恢复禹迹，不失旧物。盖夏自太康后国势衰，东夷中的有穷后羿遂因夏民以代夏政。但后羿亦非能理政者，淫于田猎，弃贤明而用伯明氏之谗子弟寒浞，卒致灭亡，以其所取归之寒浞，浞并妻其妃妾，生子浇及豷。而后相自失国后，依于同姓国斟灌、斟寻，后复见嫉于寒浞，命浇灭此二国并杀后相。相妻后缙方娠，逃出自竅，奔于母家有仍，